

从祠堂视角看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 的流变和社会文化空间分异

李 凡¹, 朱 竑^{2,3}, 黄 维¹

(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旅游系, 广东 佛山 528000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3.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明以来佛山逐渐形成八图土著宗族文化景观和侨寓宗族文化景观并存的格局, 对佛山城市空间发展产生影响。通过从古地图和文献中提取历史时期基本空间数据和祠堂等文化景观地理信息, 建立佛山历史 GIS 数据库。以此为基础, 通过景观复原、地图再现、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 以祠堂景观为视角, 解读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时空演变及其所意涵的社会文化空间意义。结果表明: ① 宋元时期祠堂主要集中在佛山南部大塘涌沿岸, 反映出宋代涌入佛山的移民早期多定居在南部; ② 明代佛山镇祠堂数量急增, 表现出聚落空间由南部向中部扩展的趋势, 祠堂景观基本形成了以南部的锦澜、东头、栅下铺和中部的祖庙、黄伞铺为中心的空间格局; ③ 清以后祠堂景观总体空间格局没有大变化, 但八图土著宗族内部产生的裂变促使土著祠堂景观发生空间扩散。土著祠堂与侨寓祠堂景观空间上既互补又相互混杂, 说明随着侨寓的大量进入, 土著传统血缘空间被打破, 地缘、业缘等因素增强, 这正适应了佛山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

关 键 词: 宗族文化景观; 祠堂; 佛山; 历史 GIS 社会文化空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09)06-0929-09

引 言

所谓宗族, 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结成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组织。在宗族关系中, 家庭是最小的单位, 集若干家而成户, 集若干户而成房, 集若干房而成支, 集若干支而成族^[1]。至少在 1949 年之前, 宗族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和活动中心, 构成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

从文化的视角看, 宗族关系又以宗族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按文化地理学对于文化景观的划分, 宗族文化景观可以分为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两种类型, 祠堂和族产都可以归为物质文化景观, 而族谱、族规和各种礼仪活动则可归为非物质文化景观。在传统社会中, 宗族是控制社会的主要力量, 其变化反映出区域社会发展, 是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学值得研究的问题。国内有部分学者从地理学视角, 探讨了宗族形成和宗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社会结构和学术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关系^[2~4]。但是, 研究内容上, 缺乏对宗族文化景观

及其时空变化的地理学解读。研究方法上, 大多采用的历史文献分析的定性研究, GIS 等地理学新技术手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

祠堂是为了祭祀祖先和管理族内事务而建立的纪念性建筑。它既是祭祀和议事的场所, 又是宗族聚居空间的核心, 成为血缘空间的“神圣中心”。因而, 研究宗族文化可以从作为文化景观的祠堂入手, 研究祠堂的空间分布、演变及其所反映出人地关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复原”和“构想”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5]。“地理学构想”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 地理空间的结构不仅是纯经济理性的直接展现, 应该是人类族群社会内部文化生活形态、社会政治关系、甚至是宗族和宗教信仰等不同部门交错作用的结果^[6]。对于传统中国城市而言, 以生产、宗教和宗族等关系为线索的社会文化空间更为重要。新文化地理学将景观作为社会文本, 强调景观解读和空间分析的理念和方法。GIS 正逐渐成为国内外历史及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手段^[7~9], 陈述彭等认为 GIS 可以应用在祠堂文化

收稿日期: 2009-03-18 修订日期: 2009-08-19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2005B310010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0771067, 40601033);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05ZD790008);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NCET-07-0889)

作者简介: 李 凡 (1968-), 男, 广东梅县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区域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研究。E-mail: fslifan@163.com

景观研究方面^[10]。基于此,本文拟将明至民国时期佛山的祠堂文化景观作为文本,通过历史GIS绘图和时空元素交互的可视化功能复原历史时期祠堂文化景观的空间状况,并藉此诠释景观所意涵的社会文化空间的意义。

2 研究地域、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佛山是明清时期著名的“天下四大名镇”和“天下四聚”之一,是“兴于明而繁于清”的中国传统工商业城市。这里五色杂陈,集中了岭南传统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其中,宗族文化尤为突出。民国初年,仅7 km²的佛山镇祠堂、家庙就达到了376座。宗族是控制佛山镇社会的主要力量,祠堂成为佛山突出的城市文化景观,因而,考察该城市宗族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及其效应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研究资料从佛山古地图和历史文献中获取。佛山古地图包括清乾隆、清道光 and 民国初年三个时期《佛山忠义乡志》所载的方志地图。其中,民国初年《佛山忠义乡志》所载的《各铺街道图》采用了详细的测绘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精确度。而且,民国时期佛山的城市改造对城市的整体空间形态影响微弱,因而《各铺街道图》基本反映了清代佛山镇的空间形态。所以,选择其作为本文历史GIS基本空间数据的地理底图。佛山祠堂等文化景观的地理空间数据主要从三个时期的《佛山忠义乡志》等历史文献中挖掘。

本研究综合使用了GIS空间分析、景观分析和历史文献分析方法。首先,以1:500佛山市数字化地图为基准,选取一定数量的控制点,在ArcInfo/Workstation的支持下,对《各铺街道图》进行校正、配准和数字化,最大程度地保留古地图上的原始信息。其次,从古地图和历史文献中提取祠堂等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以点、线和面数据类型表示。从古地图中提取的地理信息空间位置较为确定,而从历史文献中提取的是反映相对位置的地理空间信息,尽管带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基本可以清晰地呈现文化景观空间变化的图像。空间数据建立后,构建其对应的属性数据,完成历史GIS数据库的建立,通过时间属性的选择可以显示不同历史时期的景观变化。最后,基于佛山历史GIS数据库,以祠

堂文化景观为视角,探讨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流变及其对社会文化空间的影响。

3 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形成

3.1 佛山镇八图创籍与土著宗族景观的形成

“佛山肇迹于晋,胜于唐贞观年间,土人姓氏到今罕闻。宋南渡后,中原文物流入岭南,有迁至佛山者。明初编立图甲,先到诸族得占籍为地著。逮正统间,黄萧养作乱围佛山,义士梁广等二十二人合当地八图人民击退之,敕赐忠义乡,蔚为天下巨镇,自是远近相宅兹土,闾閻相望,氏族之繁,不可纪胜。南海衣冠之气,亦以吾镇为盛。”^①它概况出佛山镇氏族的形成过程:①土著四姓。约在东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国的东吴设置广州前后的时期,先后有越族“鸡”、汉族“田”、“布”、“老”四姓在佛山南部栅下大塘涌一带登陆,择地而居,开荒种地,并以渔业维生,成为佛山镇最早的土著^[11];②移民涌入。秦汉以后,中原历经战乱,导致大批人士南迁。但是由于南岭的自然屏障,进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比较有限。宋代北方战乱频繁,大批北方士民经大庾岭驿道南下到珠江三角洲(即珠玑巷移民)。据说佛山霍氏于北宋末年的靖康间(1126~1127)最早迁至佛山^[12]。宋咸淳年间(1265~1275),鹤园陈氏、石巷冼氏、白礪冼氏和江夏黄氏等氏族迁入佛山。元代又有郡马梁氏、朝市梁氏、金鱼塘陈氏和纲华陈氏迁入佛山。明代迁入佛山的还有鹤园冼氏、栅下区氏、细巷李氏和汾水洗氏。这些氏族以后大都成为了佛山镇的望族^[13]。至迟在明初迁入佛山镇的氏族还有莲花地黄氏、庞氏、伦氏、简氏、谭氏、何氏、黎氏、杨氏、关氏、岑氏、高氏、潘氏、赵氏、招氏、邱氏等^[14-15]。此外,东头冼氏为百越著姓高凉冼氏之后,南宋时东迁至佛山^[16]。大量外来氏族进入佛山定居,为明初组建佛山堡,创编图籍创造了条件;③八图占籍。明洪武三年(1370),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排里甲,编黄册,设立了集户籍制度、赋役制度以及基层社会组织制度于一体的里甲制(或称图甲制)。当时佛山始称“南海县五斗口司西淋都佛山堡”^②,堡内开八图,编八十甲,此时外来氏族纷纷立户注籍,成为合法居民。佛山原土著四姓“鸡、田、老、布”中,仅布氏在一百一十五图二甲中,可见,其余

① [民国]冼宝干. 佛山忠义乡志·卷九·氏族志.

② [明万历]南海县志·卷一·舆地志.

三大氏族已经衰落了。这样,新移民在明初里甲制中成功占籍,得到官方认可,并形成了以八图所代表的佛山镇新土著;④宗族形成。明初的创编八图,稳定了迁至佛山的各氏族,使他们在佛山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丁口兴旺,资产丰殖。明正统年间,佛山堡乡民抗击黄萧养起义,朝廷旌赏梁广等二十二人为“忠义官”,敕封龙翥祠(即佛山祖庙)为灵应祠。正德八年(1513),堡民在灵应祠右建忠义流芳祠,奉祀梁广等二十二老,反映了乡人对他们的感恩戴德,由此确定了这些家族在佛山镇的特殊地位。明代是佛山的科甲鼎盛时期,人才辈出。明正德以来,以梁储、黎涌伦氏、霍韬、梁焯、庞嵩、庞尚鹏、冼桂奇和李待问等为代表的南海士大夫集团兴起,他们大多是科举鼎甲和权倾朝野的功名人物。明世宗(嘉靖)采用礼部尚书夏言的礼制改革建议,推广大礼制,使宗祠建设得以普及。南海士大夫集团积极响应这种改革,在家乡建祠堂,立宗族,并提出了宗族发展的制度。宋、元时期佛山只有祠堂5所,明初3所,明代宣德~正德年间有5所,随后的嘉靖~崇祯年间达到了28所(图1)。可见,佛山镇的祠堂大多兴建于是明嘉靖以后,以南海士大夫集团为代表的佛山新土著势力纷纷敬宗收族,形成了佛山的名门望族。至明朝后期,佛山镇的名宦李待问和庞景忠等共同建立了“乡仕会馆”(即嘉会堂),设在灵应祠右的崇正社学内,成为佛山镇由地方宗族势力控制的民间自治机构,对佛山全镇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明代,佛山镇八图创编,通过抗击黄萧养之乱获得朝廷认可,并在南海士大夫集团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土著宗族景观,并渗透到佛山镇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重要的城市文化景观。

3.2 佛山镇侨寓的生根落户和新宗族景观的形成

佛山镇工商业的繁荣,吸引力大量的迁徙人口。史称:“佛山为省垣西南重镇,四面环海,气运所钟,商贾辐辏,人文奋兴,于今为盛。四方之迁者、侨者、从学而来者,宦成而归者,权缙笏以起家者,执艺事以自食其力者,咸以风淳俗美,乡有贤耆,梯航簪笏,麟萃云集,偕来而卜居焉。”②佛山成为珠江三角洲人们向往的城市,有希望致富的商人、求食的工匠、求学的士子、退休的官员等等。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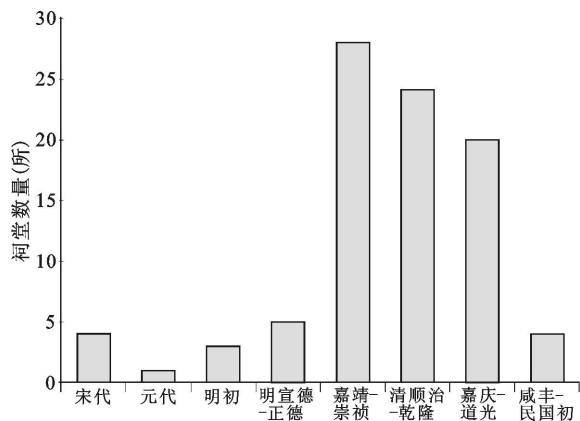


图1 佛山镇历代的祠堂数量变化

Fig. 1 Quantitativ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ancestral halls in Foshan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代前期,佛山的外来人口已占一半。正如诗云:“舟车云集此天涯,半是侨居半故家”③。这批外来人口,没有土地和户籍,被佛山土著视为“侨寓”。明代佛山八图土著只有14个姓氏。乾隆时期佛山镇的姓氏有95个^[15],道光时期达到了112个^[17],至民国初年,佛山镇的姓氏却减少到62个^[18](图2)。清初是佛山镇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至道光年间,经济发展到极盛。从上面姓氏数量反映出这一时期佛山外来人口之多,而道光以后,佛山镇经济开始衰退,与清道光年间相比,民国初年的姓氏数量减少了近一半,由此也反映出佛山镇外来人口的数量开始减少。起初,由于土著和侨寓很少冲突,而且新移民的到来也促进了佛山镇的繁荣。“粤地多以族望自豪,新徙者每不安其处,乡独无此浇习,名家巨族与畸岭之户,骤迁之客,和好无猜,故氏族至繁而门地自别”④。可见,佛山土著对于新移民的态度是宽容和接受的,这就为侨寓人口在佛山的生活和创业提供了和谐的社会环境。

清代,佛山侨寓人才辈出,大大超过了土著人物之数。根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进行统计,仅有三类人物侨寓略低于土著,即孝友、艺术和贤淑,耆寿和货殖两类恰好相同。其余十一类人物侨寓数量均高于土著两倍以上,在清代名臣中,全为侨寓人物,如左必蕃、吴荣光、骆秉章、戴鸿慈、梁僧宝和李文田等。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选举志》统计可知,清代佛山登进士者共38名,其中土著13

① [清道光]吴荣光. 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下·重修佛山海口文昌阁记。

② [民国]冼宝干. 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五·艺文三。

③ [民国]冼宝干. 佛山忠义乡志·卷九·氏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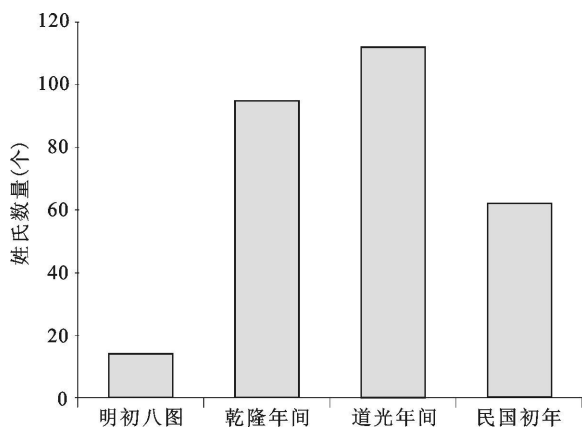


图 2 佛山镇历代姓氏数量的变化

Fig 2 Quantitativ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family names in Foshan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名, 占 34.2%, 侨寓 25 名, 占 65.8%, 侨寓远多于土著人士^[19]。在清代佛山宗族之中, 把辈出科举合格者和官僚的宗族称作“官族”, 其他宗族叫“杂姓”。据井上彻的统计, 佛山的官族乾隆时合计有 47 个, 道光时合计 55 个。这些官族之中“土著”者仅有 13 个, 有 34 姓或 42 姓的“侨寓”^[20]。显然, 在清代侨寓人物中的功名人物和官族都远多于土著。

这样, 侨寓家族为了在佛山购置土地、房产的需要, 附图占籍者甚多, 以至于超过了土著。“(佛山)自前明设镇后, 四方辐辏, 附图占籍者几倍于土著”^①。随着侨寓氏族在佛山的发展, 人丁兴旺, 为了凝聚整个家族, 立祠堂, 敬宗收族变得十分必要。他们往往以家庭为单位, 设立以书斋、书舍、书室、书塾等为名目的祠堂, 又称“私伙太公”。据笔者对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统计, 此种类型的祠堂有 50 所, 侨寓就有 30 所^[18]。

随着侨寓宗族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等领域的成就日盛, 土著宗族势力相对衰落。侨寓和土著势必会产生相互冲突, “夫主客并峙, 嫌隙易生”^②。侨寓宗族势力开始谋求在佛山镇社会文化方面的地位。由于早期侨寓人士不具备进入由佛山土著把持的崇正社求学和议决公事的资格, 清康熙八年 (1669), 由侨寓人士倡建田心书院, 成为集合侨寓人士中精英和教育子弟的双重功能, 维护了侨寓集

团的利益。乾隆三年 (1738) 佛山侨寓士绅积极参与组织大魁堂, 取代了原由八图土著控制的嘉会堂, 获得了控制佛山全镇的话语权^[13]。有清一代, 随着侨寓人士在佛山的落户生根, 侨寓宗族势力渗透进佛山社会、文化和生活各方面, 并逐渐成为管理佛山镇的新生政治力量, 形成清代宗族文化的新景观。

4 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及其诠释

根据佛山镇宗族文化景观 (即祠堂) 空间数据库, 相应地赋予祠堂名称、姓氏、氏系、地址、所属铺名 (“铺”为佛山镇行政区划的基本单位)、是否为祖祠、居民类型 (土著和侨寓)、始建时间等属性特征。按《佛山忠义乡志》记载, 民国初年佛山镇共有祠堂 376 座, 基本上能够确定其绝对位置或相对位置的祠堂有 334 座。选取数据单元 (cell size) 大小为 10m, 搜索半径 (Search radius) 为 500m, 建立佛山镇的祠堂景观 Kernel 密度图, 通过与侨寓祠堂和土著祠堂景观等要素相叠加, 以反映佛山镇宗族文化空间的分布及其变化, 并解读土著氏族与侨寓氏族的空间聚落关系。

4.1 佛山镇宗族文化景观的时空演变

明代至清初, 佛山镇北部的佛山涌 (汾江) 成为西、北江通往广州的主要航道, 是“东南一大咽喉”^③。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得到空前发展, 加之封建政府在经济、文化方面给予佛山的一些特殊政策 (如冶铁业的“官准专利”等), 促使佛山城市规模迅速发展。明景泰年间的佛山, 已是“民庐栉比, 屋瓦鳞次, 几万余家。”^④佛山镇内划分为二十四铺行政区。至清乾隆年间, 增加至二十五铺。道光年间, 市区又增加到二十七铺, 佛山已是“人稠地广, 烟户十万余家”^⑤, 人口激增到约 60 万^[21]。而在汾江沿岸, “佛岗 (山) 之汾水旧槟榔街, 为繁盛之区。商贾丛集, 阗阗殷厚, 冲天招牌, 较京师尤大, 万家灯火, 百货充盈, 省垣不及也。”^⑥成为佛山商业繁华地带。随着城市发展和空间的变化, 透过祠堂景观的分析, 可以发现佛山宗族文化时空演变

① [民国] 冼宝干. 佛山忠义乡志·卷九·氏族志·氏系.

② 重修佛山堡八图祖祠碑记. 见: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257

③ [清道光] 吴荣光. 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上·修浚旗带水记.

④ [清道光] 吴荣光. 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上·祖庙灵应祠碑记.

⑤ [清道光] 吴荣光. 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下.

⑥ [清] 徐珂. 清稗类钞·卷十七·农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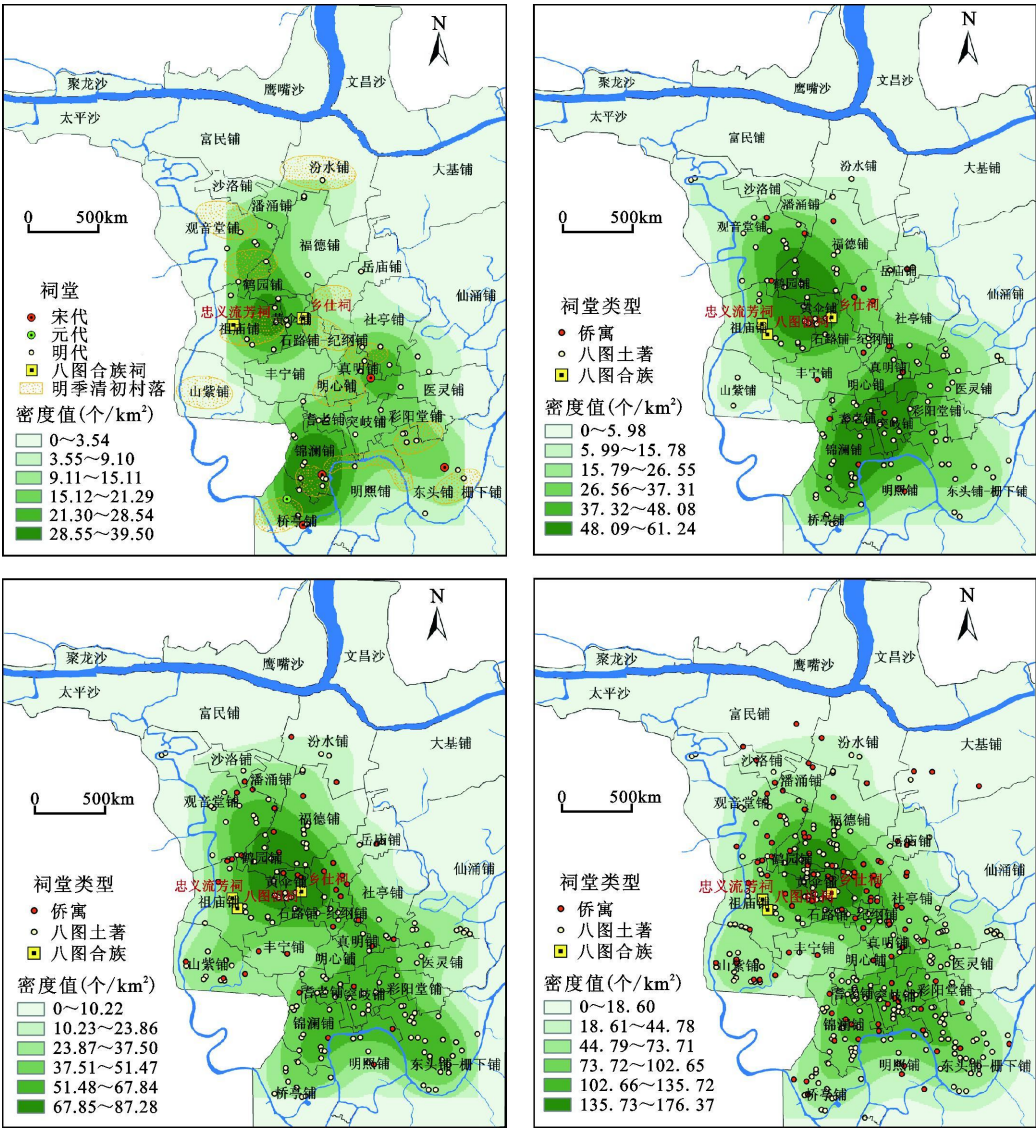


图 4 佛山镇祠堂景观的时空变化

Fig 4 Spatio-temporal change in the ancestral hall landscape in Foshan

宗祠,修建的时间比较早。小宗祠是各分房的次级祠堂。私祠是指只属于某一个或几个家庭所有,不属于整个宗族。还有自建纪念先祖的,称为“家庙”。清代后期,宗族内部的平民意识抬头,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个人成就,在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住宅命名为“厅”、“书舍”、“香火堂”等,在其死后即成宗祠。这类宗祠叫做“私祠”(粤俗称“私伙太公”)。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宗祠——合族祠,是“同姓不同宗者(甚至是不同姓氏者),采取虚立名号,联宗通谱,联合一县至数县甚至数十县而建立起来的。故粤俗称这类“始祖”和祠堂为“众人太公”^[23]。弗里德曼(Freedman)的宗族模型理论阐述了宗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相关性。他提出宗

族的“地域世系群”、“分散世系群”和“上位世系群”的概念,“地域世系群”是“由居住在一个聚落内或稳定的聚落群内的父系成员所构成的自律性集团”。当宗族超越一个聚落体或聚落群,并在外部加以扩展时,就形成了“分散世系群”和“上位世系群”。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指一个“地域世系群”中的一部分成员分散居住到聚落之外,后者则指由若干个“地域世系群”根据父系世系关系组成的联合体^[26]。显然,弗里德曼的这些概念与大宗祠、合族祠、小宗祠和私祠等宗族聚落空间的中心是相对应的。宗族的裂变和整合,由“地域世系群”到“分散世系群”、“上位世系群”的变化,势必会带来祠堂系统景观的变化,而祠堂景观的变化对

应着宗族文化空间的演变过程(表 1)。

表 1 明清佛山镇的四种祠堂及其地缘、血缘空间的比较
Table 1 A geographical and blood tie related comparison of four types of ancestral halls
in Foshan in theM ing andQ ing Dynasties

宗祠类型	私祠	小宗祠	大宗祠	合族祠
祭祀覆盖范围	个别家庭	某一房或派	整个宗族	省内或部分县内的同姓宗族
血缘、地缘关系	最亲近的血缘关系	较亲近的血缘关系	同一始祖的血缘关系 整个宗族居住区内,通常	地缘关系
地理范围	某宗族居住区内	某宗族居住区内	一姓在一村内有一个大 宗祠	数县或全省的同一姓氏
通常名称	××书舍、××厅、×× 书塾等	×氏××公祠	×氏大宗祠	××书院
祭祀的人物	生前自设宗祠,死后由直 系亲属祭奠	宗族内非始迁祖的突 出人物	始迁祖	虚拟的共同祖先,一般附会历 史名人
尝产的受益范围	个别家庭	某一房或派	整个宗族	管理操控合族祠的少数人
基本功能	生前居住,死后祭祀	祭祀、管理房派内的族 人	祭祀、管理族人	同姓的多个宗族办理事务的 落脚点和联络点
建筑景观	民居住宅	祠庙建筑	祠庙建筑	祠庙建筑

资料来源:周毅刚.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发展及其形态研究. 博士论文.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 2004. 239 经修改.

宗族存在着扩展、消亡的裂变过程。分散世系群的宗族文化景观出现,总的来说削弱了“大宗祠”的向心力。佛山八图土著的这种变化及势力的衰弱,使八图土著传统的血缘聚落空间被打破。清代,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佛山,费孝通称地方社区的外来人口为“客边”、“新客”、“寄藉”(在佛山称为“侨寓”),“从集市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寄寓在血缘性社区边缘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24]。清代进入佛山镇的侨寓人口成为商贸活动的主力军,并结成了地缘性的社区。伴随着他们商业上的成功,逐渐产生了新兴的侨寓士绅集团,他们参与佛山镇的管理,并在佛山落户生根,侵入传统的土著宗族的地域范围,形成了新的侨寓宗族景观,打破了以血缘为主的传统乡土社会,开始向以地缘为主的商业社会转变,反映佛山镇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聚落空间社会性质的转变。

望族大姓的宗祠占佛山镇宗祠数量的主体,他们多为八图土著,并长期把持佛山镇的地方政治权利。民国《佛山忠义乡志》中记载的宗祠姓氏有 58 个,仅李、梁、陈、冼、霍、黄 6 大姓氏的祠堂就占总量的 61.43%。同时,侨寓姓氏祠堂达到了 111 座,占总量的 29.5%^[18]。如图 4 所示,通过祠堂景观的交互式叠加分析可以折射出明代以来的土著氏族与侨寓氏族聚落空间的变化。

佛山镇明代的祠堂均为八图土著氏族所有,具有明显的宗族聚落空间。当时的佛山十五村,几乎

每个村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主要宗族的居住区组成,从这些祠堂景观可以反映八图土著宗族聚居空间的地域差异。

清代以来,随着佛山镇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也带来了佛山镇宗族文化景观空间的如下变化:

(1)八图土著祠堂景观空间扩散。这说明八图土著宗族内部产生裂变,随各房支的镇内外迁徙而使宗族文化景观扩散。这样,原有宗族的向心力逐渐被削弱。

(2)在佛山镇中南部,土著祠堂景观与侨寓祠堂景观相互混杂。反映出各姓氏的外来人士和本地人开始在八图土著集聚的地域范围附近,乃至内部定居或从事工商业活动。从清乾隆、清道光至民国初年三个时期看,侨寓祠堂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很多都侵入到中南部八图土著宗族的聚落空间内,既增强了这些地域祠堂景观的密度,并由此带来社会文化空间的重组。清代吴氏以盐商起家,乾隆年间吴荣光的父辈有兄弟十人,曾历任有盐大使、盐运经历和盐总商等职,家事豪富。吴氏家族陆续购地建屋,沿洛水一带建立了不少园宅,其中的“西园”和“鉴帷别墅”就是购置原鹤园冼氏聚居的鹤园故地而建成。吴氏兄弟把鹤园故地改建后,易称“大树堂”^[13]。从“鹤园故地”到“大树堂”的变化,反映了宗族聚落空间的重组,从此“大树堂”成为吴氏宗族的聚居区。

(3) 土著祠堂与侨寓祠堂景观还有一定的互补性。由于传统乡土社会的聚落空间内, 血缘关系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中南部为主的土著宗族聚落空间的核心区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北部的富民铺、汾水铺和大基铺, 以及中部的沙洛铺、潘涌铺和岳庙铺, 这些铺区土著祠堂少, 但却有一定数量的侨寓祠堂景观, 这说明佛山镇内铺屋密、地价高, 侨寓人口有相当一部分在佛山镇的周边各铺定居。在佛山民国初年的《名铺街道图》中, 八图土著传统的聚落空间很少看到四周是围墙的居住地, 而在侨寓庄园处, 多数都有比较醒目的围墙符号, 形成了一块块以围墙为标识的既有祠堂又有民居的侨寓庄园, 这与孤零零的单独的土著祠堂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土、侨祠堂景观的差异, 反映出清末民初八图土著宗族势力已经基本解体。尽管引起八图土著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毋庸置疑的是清代佛山宗族组织解体的最基本动因还应归究到侨寓人士的大量涌入。侨寓人口的大量进入, 带来了佛山镇社会文化空间的重组, 人们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物质利益取代了血缘亲情, 八图土著的血缘空间被打破, 越是靠近北部商业区的土著宗族空间解体得也越早越快, 如汾水洗氏、鹤园洗氏等。由此而带来佛山镇聚落空间的血缘关系减弱, 地缘、业缘等因素增强。这正适应了佛山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

5 结论与讨论

以祠堂为视角, 通过对历史时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解读, 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 明初编立图甲, 先到佛山的诸氏族得以占籍为地著。再通过抗击黄箫养之乱获得朝廷认可, 并在南海士大夫集团的推动下, 逐渐形成了土著宗族景观。有清一代, 佛山繁盛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迁徙人口, 侨寓人士开始在佛山落户生根, 侨寓宗族势力渗透进佛山社会、文化和生活各方面, 成为宗族文化新景观。

2) 宋元时期的宗祠主要集中在佛山镇南部大塘涌沿岸各铺, 反映宋代涌入佛山的移民早期定居在南部栅下、桥亭等铺; 明代佛山镇祠堂数量急增, 表现出聚落空间由南部向中部扩展的趋势, 祠堂景观基本形成了以南部的锦澜、东头、栅下铺和中部的祖庙、黄伞铺为中心的空间格局, 并由此可确定明代佛山镇聚落的基本空间范围。

3) 清代以后, 祠堂景观空间格局总体没有很大的变化。但是通过土著和侨寓祠堂景观的 GIS 叠加分析可见社会文化空间的分异: ①八图土著祠堂景观空间扩散, 说明八图土著宗族内部产生裂变, 随各房支的镇内外迁徙而使宗族文化景观得以扩展, 使得原有宗族的向心力逐渐被削弱; ②土著祠堂与侨寓祠堂景观还有一定的互补性。传统乡土社会的血缘关系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以中南部为主的土著宗族聚落空间的核心区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而在土著祠堂分布相对较少的北部和周围铺区, 却有一定数量的侨寓祠堂景观; ③在佛山镇中南部, 土著祠堂景观与侨寓祠堂景观相互混杂。由此说明了随着侨寓的大量进入, 八图土著的传统血缘空间被打破, 地缘、业缘等因素增强, 这正适应了佛山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

总体来看, 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变化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历史时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研究, 对于理解当今佛山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及其特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周多礼. 宗族文化的复兴和对策研究 [J]. 理论建设, 2006 (6): 54-58
- [2] 秦 燕. 明清时期陕北社会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 17(3): 68-76
- [3] 关传友. 论明清时期宗谱家法中植树护林的行为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2, 17(4): 65-72
- [4] 赵英丽, 韩光辉. 楠溪江流域宗族与学术高峰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 21(1): 24-84
- [5] 阙维民. 历史地理学的观念: 叙述、复原、构想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2-6
- [6] 陈其南. 台湾地理空间想象的变貌与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个初步的探索 (上) [J]. 地理研究 (台湾), 1999 (30): 175-219.
- [7] 李 凡, 朱 竑. GIS 在历史及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国外研究进展综述 [J]. 人文地理, 2009, 24(1): 41-45
- [8] 李 凡. GIS 在历史、文化地理学中的应用及展望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8, 24(1): 21-26
- [9] 李 凡, 符国强, 齐志新. 基于 GIS 的佛山城市文化遗产景观风险性的评估 [J]. 地理科学, 2008, 28(3): 431-438
- [10] 陈述彭, 黄 翀.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 [J]. 地理研究, 2005, 24(4): 489-497.
- [11] 区瑞芝. 佛山新语 [Z]. 1992. 71-72
- [12]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 卷九 十五世祖乐天公家传.
- [13] 罗一星. 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32-36, 377, 314-315

- [14] (清乾隆)陈炎宗. 佛山忠义乡志[Z]. 卷六. 乡俗志. 氏族.
 [15] (清乾隆)陈炎宗. 佛山忠义乡志[Z]. 卷三. 乡事志.
 [16] 冼宝干. 岭南冼氏宗谱[Z]. 卷三之六. 分房谱. 东头房.
 [17] (清道光)吴荣光. 佛山忠义乡志[Z]. 卷五. 乡俗. 氏族.
 [18] (民国)冼宝干. 佛山忠义乡志[Z]. 卷九. 氏族志.
 [19] (民国)冼宝干. 佛山忠义乡志[Z]. 卷十三. 选举志.
 [20] (日)井上彻. 魏校的捣毁淫祠令研究——广东民间信仰与儒教[J]. 史林, 2003(2): 41-51.
 [21] 佛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佛山市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199.
 [22] 明万历. 南海县志[Z]. 卷一. 舆地志. 都里.
 [23] 陈忠烈. “众人太公”和“私伙太公”——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设施看祠堂的演变[J]. 广东社会科学, 2000(1): 70-76
 [24]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8. 71-75.
 [25]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 刘晓春译.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
 [26] (日)濂川昌久. 钱杭译. 族谱: 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68-74.

Change and Socio-cultur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Clan Cultural Landscape in Foshan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 Perspective of Ancestral Halls

LIFan¹, ZHU Hong^{2,3}, HUANG Wei¹

(1. *Tourism Department,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000;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3. 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co-existence of two types of clan cultural landscape, eight Tu aboriginal clan cultural landscape and immigrant clan cultural landscape, has gradually formed in Foshan an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paces in Foshan. The paper, by extracting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cultural landscape such as the ancestral halls and basic spatial data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ancient map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establishes a historical GIS database for Foshan. Based on it and a review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e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ncestral hall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o-cultural spatial meanings connoted in the temporal-spatial changes occurred in clan cultural landscape in Foshan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by the means of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map revisualization, spatial analysis and landscape analysis. The paper finds that (1) most of the ancestral halls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ere concentrated along the shores of Datangchong, south of Foshan, which indicates that immigrants pouring into Foshan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usually settled down at first in the southern part; (2) ancestral halls in Foshan in the Ming Dynasty increased quickly in number and displayed a south-to-centre tendency in the expansion of gathering space, which resulted in the primary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ancestral hall landscape, with Jinlan, Dongtou, Shanxia Pu in the south and Zumiao, Huangsan Pu in the centre; (3) since the Qing Dynasty, there has seen little change in the general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ancestral hall landscape, though cracks from the inside of eight Tu aboriginal clans sped up the expansion of the ancestral hall landscape of the aboriginal clans in space, the phenomenon of the spatial complementation and alternation in the ancestral hall landscape of the aborigines and of the immigrants illustrates that with the ent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the traditional blood tie space was broken and geographical and business related factors were more emphasized, which just coped with the macro-tendency of urbanization in Foshan.

Key words clan cultural landscape; ancestral hall; Foshan; GIS; social cultural space